

【区域创新发展】

中部地区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路径优化研究*

宋保胜 吴奇隆 赵明正

摘要: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够发挥金融资源功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而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由于受政策制度、初始经济条件以及效益指标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中部地区的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呈现出失配、错配等非均质现象,金融资源无法释放其全部潜力,造成资金供需不均衡,有效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金融能量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为提升中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应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化解政策、市场、利益等单方面约束,选择差异性、多样性等不同层次的路径,促进金融资源有效应用,从而保障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和谐发展。

关键词:中部地区;金融资源;空间异质;帕累托最优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1)02-0106-10 **收稿日期:**2020-11-09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研究)项目“河南省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资金诉求的响应及有效对接研究”(202400410075);2020年度河南科技智库调研课题“构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机制和路径研究”(HNKJZK-2020-07C);2020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科技创新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微观机理及有效对接的影响因素研究”(020-ZZJH-187);2019年度河南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高等农业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对接机制研究”(20190107);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与贸易合作潜力研究”(19YJC790194)。

作者简介:宋保胜,男,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450046)。

吴奇隆,男,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生,通讯作者(郑州 450046)。

赵明正,男,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通讯作者(郑州 450046)。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强调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应结合其现实需求,加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科学合理配置,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2月22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提出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二者协调发展,强调从宏观层面推进金融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微观方面注重金融资源存量的重组

和增量优化,全面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质量,提高防范金融风险能力。目前,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特殊时期,需要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这是因为,高效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通过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可以促使各类生产要素进行重新优化组合,促使产业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从而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而是提高经济发展的品质效应与现实生产力的高质增速效应的现实要求。

一、中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现状审视

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指一国或地区对本国(地区)金融资源的合理集聚和整合,并通过运用来最大限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中各种可能的选择性需求,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金融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对促进金融和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具有基础性的

影响。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本要素,金融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有效推动发展中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呢?课题组以中部六省金融资源配置情况为对象,对发展中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现状进行调研审视。利用中部六省2019年度的国民生产总值、存款余额、贷款余额、股票筹资额和保险费收入等总量指标,分别度量银行业、证券、期货行业、保险业等金融资源的地区分布和差异,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2010年、2019年中部六省金融资源分布情况表

(单位:年、家、亿元)

金融行业	区域指标	河南		湖南		湖北		山西		安徽		江西	
		2010年	2019年	2010年	2019年	2010年	2019年	2010年	2019年	2010年	2019年	2010年	2019年
银行业	机构数(家)	181	240	136	174	108	158	125	210	104	166	112	173
	存款额(亿元)	23148.83	70771	16643.27	52660.4	21769	59747.7	18639.8	38381.4	16366.1	54786.8	11907.8	38952.5
	贷款额(亿元)	15871.32	56893.6	11521.67	42415.4	14648	50663.96	9728.7	28119.4	11452.3	44289.3	7757.1	35493.8
	存贷比	0.69	0.80	0.69	0.81	0.67	0.85	0.52	0.73	0.70	0.81	0.65	0.91
证券期货行业	机构数量(家)	55	221	70	111	78	110	38	42	70	110	33	301
	证券公司(家)	1	1	3	3	2	2	2	2	2	2	2	2
	期货公司(家)	0	137	0	0	0	0	0	0	0	0	0	255
	基金公司(家)	3	2	4	3	3	2	5	3	3	3	1	1
	上市公司(家)	51	81	63	105	73	106	31	37	65	105	30	43
	筹资额(亿元)	350	1969	536.1	1263.7	767	2640.7	506	2003.8	500	1624	240	1035
	股票筹资(亿元)	142	765	228.1	46.2	218	838	223	33.4	171	90	124	27
债券筹资(亿元)	208	1204	308	1217.5	549	1802.7	283	1970.4	329	1534	116	1008	
保险行业	公司数量(家)	47	6661	39	58	46	81	31	54	39	69	28	49
	法人机构(家)	0	1	0	1	1	4	1	1	1	1	0	1
	分支机构(家)	47	6660	39	57	45	77	30	53	38	68	28	48
	保费收入(亿元)	793	2431	438.5	1396.1	500	1728.6	365	883.3	438.2	1349	253	835.2
	保险密度(元/人)	789	2531	626	2018	875	2916.4	1066	2368.8	716.3	1894.8	563	1797
	保险深度(%)	3	5	2.9	3.5	3	3.8	4	5.19	3.6	4	3	3.4

数据来源: <http://www.pbc.gov.cn/zhengcehuobisi/125207/125227/125960/126049/126077/2852056/index.html>(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4030508/index.html>(2019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1. 金融资源增速匹配经济增长,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增强

作为特殊的资源,金融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金融资源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最重要的资金要素,还能通过金融服务需求,使金融资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外在动因;另一

方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能为金融资源总量增加提供累积空间,使其成为区域内金融资源动态配置效率基础。近年来,中部六省的GDP逐年增长,由2010年的85437.39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18737.79亿元,年平均增速9.86%。中部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为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夯实了基础。从

表1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2010年中部六省金融资源总量为79445.46亿元,2019年中部六省金融资源总量为286652.51亿元,金融资源总量增长3.6倍,年均增长率13.69%;金融相关率也由2010年的0.93增长到2019年的1.31,年均增长率3.48%,金融资源的增长比例超过经济发展速度,有效支撑了经济发展。金融业稳健运行,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金融资源供应量持续增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能力增强。近年来,在金融资源配置引导下,中部地区整体投资增速平稳,投资结构趋于协调,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产业调整稳步推进,结构持续优化,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结构为8.18:41.78:50.04,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服务业增速明显,新动能增长较快。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金融资源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支撑引领作用更加凸显,中部六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3%,区域内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5.5个、1.3个百分点,对区域内经济的增长具有较强拉动力。

2. 银行信贷资源增速平稳,贷款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银行信贷资源是否充足、配置是否合理有效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近年来,中部六省银行信贷资源总量逐年提升,贷款去向多元化趋势较为明显,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表1,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设置的各类银行机构达到1121家,比2010年设置的各类银行机构766家增加了355家,年均增长3.86%,初步形成了城乡互动、中外互补格局。银行机构的市场竞争更趋充分,服务地方经济能力逐步增强,凸显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各类银行机构吸收本外币存款共计315299.8亿元,比2010年各类银行机构吸收本外币存款108474.8亿元增加了206825亿元,年均增长11.26%,各类存款数量的增加,为商业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有效促进了各种社会闲置资金向生产性资金转化,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支持。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各类银行机构共发放本外币各项贷款共计257875.46亿元,比2010年各类银行机构发放本外币各项贷款70979.09亿元增加了186896.37亿元,年均增长13.77%。在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的情况下,中部六省贷款规模逐年增加,较好地支持了经济平稳增长,同时,信贷结构趋于优化,信贷资源向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较为明显,绿色环保产业贷款、民营企业贷款、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分别增长5.1%、3.2%、4.12%、3.14%。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信贷资源供应,满足了实体经济多层次、多元化金融需求。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设置的各类银行机构存贷比为81.79%,比2010年各类银行机构存贷比65.43%增加了16.36%,银行机构存贷比逐年增加,年信贷资源剩余逐渐缩小,表明中部六省信贷资源服务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

3. 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直接融资能力持续提高

作为中长期资金借贷融通活动的市场,近年来,中部六省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通过资本市场引导资金流动,融资功能得到了加强,推动了资金的合理配置,各类经营主体直接融资取得重大突破,加速资本积累的杠杆作用,使社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促进了资金的积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共有各类证券机构895家,比2010年的344家增加了551家,年均增长10.03%(见表1)。证券机构数量的增加,完善了中部地区证券经营机构体系,为经济实体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创造了条件,夯实了服务地方经济基础,增强了经济实体持续发展的资本实力。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各类证券机构共计直接融资总额10536.2亿元,比2010年直接融资总额2899.1亿元增加了7637.1亿元,年均增长13.77%,其中,股票融资2019年年底总额1799.6亿元,比2010年年底股票融资总额(1106.1亿元)增加了693.5亿元,年均增长4.99%,债券融资2019年年底总额8736.6亿元,比2010年债券融资总额(1788亿元)增加了6948.6亿元,年均增长17.19%(见表1),各类证券机构直接融资金额的快速增长,利用再融资平台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增发、发行可转换债和公司债等多种形式再融资,增强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筹措更多的发展资金,有效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制约瓶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实现了公司治理、经营机制的转换和产业升级,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拓展了发展空间,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4. 保险业务发展迅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断提升

一般来讲,保险业通过承保业务获取并分流部分社会储蓄,然后又通过对实体经济投资将积累的保险资金运用出去,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规模,体现了保险业作为金融机构的资金融通功能,为各类经济实体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辖区内共有保险公司总公司及分支机构6972家,比2010年的230家增加了6742家,年均增长40.66%(见表1),保险业机构数量迅猛的增加,对银行业资金融通也是有效的补充,也有利于金融融资结构的优化配置,提高保险金的快速转化,提升资本市场效率,促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同时,保险业机构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保险密度增加,体现保险普及程度较好,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取得的保险密度为2265元,比2010年的772.55元增加了1492.45元,年均增长11.36%(见表1)。保险密度的增加,促进了保险机构的保费收入增加,拓宽了经济实体融资渠道,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了资金保障。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取得的保险费收入总额为8623.2亿元,比2010年的2787.7亿元增加了5835.5亿元,年均增长11.95%(见表1)。保险资金属于负债型长期性资金,是经济实体长期资金来源之一,对区域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分散风险和储蓄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另外,保险市场发展能推动保险深度增加,体现了保险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的保险深度为4.15%,比2010年的3.18%增加了0.9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7%(见表1),保险深度的增加,说明中部六省的保险市场发展程度较好,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保险资源在总量上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

二、中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分析

为了解中部六省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情况,笔者于2020年7—9月,对中部六省部分城市、乡(镇)的金融资源配置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访谈。该次调查针对金融机构共发放问卷560份,收回有效问卷548份,有效回收率97.86%;针对涉农部门共发

放问卷720份,收回有效问卷686份,有效回收率95.28%;针对制造业共发放问卷860份,收回有效问卷819份,有效回收率95.23%;针对第三产业共发放问卷860份,收回有效问卷816份,有效回收率94.88%。依据调研数据结合2009—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等相关数据,利用stata统计软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结合实地调研情况,中部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1. 政府干预不当,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

资源约束条件下,规模驱动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效率优化之路的必然性(马娟,2017)。各类资源以效率优先为准则自由流动,以获取最大化的经济效益。金融资源配置决定着各经济主体对金融资源的拥有量以及由此所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组合,产生最大的效益。通过对中部六省部分金融机构的调研,针对所收回的548份问卷进行整理分析,发现中部六省在对金融资源配置中,政府介入较多。2019年度,548家金融机构共发放3271笔各类贷款,涉及金额达1024.37亿元,其中有地方政府介入的2876笔,金额达739.54亿元,占比分别达到87.92%和72.19%,致使实体经济中更具效率、更具投资价值的行业或企业未能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不仅助长了产能过剩,还恶化了融资环境。另外还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使产业结构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同时,加上司法信用环境不完善和发展金融市场中介组织的不完备,使得金融机构日常管控不够严密,造成履约风险加大。根据调研的结果显示,政府干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中信贷违约率达48.97%,呆、坏账中有政府介入的达86.39%,违约率、呆坏账率增加,资源浪费严重,且没有得到合理配置,降低了资本的配置效率。

2. 金融资源配置结构错位,经济综合效应低下

金融资源配置结构均衡是指在一定区域内金融资源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在结构、时间和空间对接方面的平衡、匹配和协调状态,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均衡将直接影响到区域内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中部六省金融资源总量逐年增加,截至2019年年底,区域内金融资源总量达到282702.15亿元,与2010年同口径金融资源总

量78664.78亿元对比,增加204037.3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65%,平均增速高于同口径全国水平1.37个百分点。虽然中部六省金融资源供给总量有所增加,但面对乡村振兴、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融资诉求,金融服务和产品供给明显不足,存在供需不匹配,阻碍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从实际调研情况看,金融资源配置呈现出显著的结构错位现象:一是供需总量错位。在所调研的2321家企业中,有贷款需求的2031家,占比87.51%,但真正能够完全满足贷款需求的企业,仅有406家,仅占17.49%。金融资源供需不到位,致使一些有资金需求的企业在生产运营中因缺乏资金,造成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等方面受到影响,阻碍运营质量提升。二是期限错位。基于信息不对称下信贷配给理论,金融机构贷款产品的期限趋于短期化,也存在放贷过于谨慎,期限结构失衡的问题,难以满足第一、三产业生产需求。在所调研的1502家一、三产业企业中,有长期贷款需求的1275家,但需要真正能够得到完全满足的仅有154家,仅占12.08%。三是服务主体错位。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缺少相应抵押物,其金融资源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调研的结果显示,得到贷款需求企业中有76.38%是属于国有企业或规模上市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供给”不足与“无效供给”过度的问题,使资金剩余的企业更加容易得到贷款,资金需求大的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很多大企业很容易进行大规模的扩张,造成产能过剩,弱化了金融资源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力度,金融资源配置经济综合效应不明显。

3.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分布不均衡,区域间经济发展“马太效应”严重

作为现代经济配置资源的核心,其配置均衡和高效运转可以改善实体经济的投融资效率,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张晓朴、朱太辉,2014),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金融的逐利性等因素的叠加,使得不同区域在获得外源融资方面存在着差异,金融资源功能发挥受阻。如表1所示,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中,河南省金融资源总额为62601.14亿元、湖北省金融资源总额为55934.3亿元,分别占中部六省金融资源总额的22.14%和19.79%;江西省和山西省金融资源分布较为薄弱,其金融资源总额分别是38311.80亿元和31101.44亿元,分别占中部六省金融资源总额的13.55%和11.01%,金融资源

的区间不均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较为明显,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中,河南省GDP总额为54259.20亿元、湖北省GDP总额为45828.31亿元,分别占中部六省GDP总额的24.81%和20.95%;江西省和山西省GDP总额分别是24757.5亿元和17026.68亿元,分别占中部六省GDP总额的11.32%和7.78%。另外,在同一区域,金融资源分布极度不平衡,以金融资源相对较好的河南省为例,郑州市一支独大,2019年度存款总额为23356.1亿元,占全省的33.01%;贷款总额为25364.3亿元,占全省的44.58%;存贷比达到108.60%,均居全省第一;股票筹资额为629亿元,占全省的31.94%;金融相关率为2.32。金融机构的“城市化偏好”呈现出“虹吸效应”,使一些经济不发达县域、农村等区域,金融机构网点缩减严重,贷款总额减少,城乡呈现金融资源冗余和不充分现象,由此导致的非效率对生产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致使金融资源两极分化严重,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

4.金融资源配置路径单一,配置成本较高

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是以服务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作为运营的主要目的,利用直接或间接的融资方式,将资金配置到实体经济的业务运转过程中,引导其他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组合,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健康有效运行。一般来讲,直接融资配置不通过金融中介机构介入,资金供应者在金融市场上购买有价证券,或资金供需双方直接就资金的使用额度、期限、使用费等签订协议,将货币资金直接提供给需求企业使用,对投资者来说收益较高,对筹资者来说成本却又比较低。间接融资则是指资金供需之间不发生直接关系,而是通过金融机构实现资金融通的过程,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对资金需求者限制的条件多,手续繁琐,融资过程时间较长,成本较高。如表1所示,截至2019年年底,中部六省同口径融资总额282702.15亿元,其中,通过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机构直接融资总额为10529.1亿元,只占同口径融资总额的3.72%。另外,依据实地调研的结果显示,2321家样本中,有333家企业以直接方式,通过信托公司、基金公司、金融控股公司等机构参与融资过程,仅占样本的14.35%;有1988家企业通过银行以间接融资方式完成融资,占比85.65%。融资渠道的单一,

缺乏金融产品创新,造成金融主体之间缺乏充分的竞争,间接融资的主动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金融资源配置如何配置,由金融机构决定。有些金融机构为保证资金安全回笼,制定一些约束条款和繁琐的配置程序,造成金融资源配置成本增加,影响金融资源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转换和交流,不利于资金快速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的提高,削弱资金配置效率。

5. 市场配套机制不完善,金融资源配置流程不畅

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金融市场配套机制保障,金融机构应依据金融市场实际诉求,对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金融通所设置和制定的辅助制度和相应准则,包括金融资产、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体制等一系列措施。完善、合理的金融市场配套机制,可以有效促进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进行合理配置,有效降低金融市场供求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金融资源跨时间、跨区域的分配提供方法和运行标准,能快速有效引导资金资源转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中部六省作为经济发展中地区,金融市场相关的配套机制不尽完善,各项辅助制度不尽合理,阻碍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在对中部六省部分城市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有完备的产权综合交易平台的城市只有34个,占比27.78%;资产价值评估和交易登记等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城市有26个,占比33.33%。中介平台和相应辅助机制的不完善,加大了金融机构风险,同时,也使资金需求的实体单位得不到相关中介平台的鉴定保证,难以取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加上政府对金融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国有大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行为偏好性和小微企业的分离行为。另外,农民财产所有权的确定困难,加上专业性的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缺失,相关财务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匮乏,一旦发生贷款无法收回,金融机构难以通过抵押物流转的方式减少损失,使得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有限金融资源的渠道不够畅通。

三、中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的症结分析

金融资源配置低效是金融资源的最大浪费,也是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因素,那么,中部地区

金融资源配置低效的症结或者说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以上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中部六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内在原因在于以下5个方面。

1. 考核管理激励机制不科学,致使政府过多干预金融资源配置

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地方政府干预不当使得金融资源错配现象严重,造成信贷资源成为“第二财政”,不仅形成了重复投资,也造成了一些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干预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目的是地方发展获取资金支持,其内在动机是行政集权而财政分权下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激励的“晋升锦标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以经济增长为官员“晋升锦标赛”的行政管理模式,为地方官员提供了充分的升迁激励,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或地方官员“为晋升而竞争”所产生的超量信贷资金需求,政府可以通过行使由公共权力衍生而来的资源再分配权力干预金融资源配置获取,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过于考虑GDP或受短期利益的驱使,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以行政命令方式直接介入金融资源配置,短期内地方政府领导任期经济得到了增长,各项考核指标达到要求,但是因为相关调控措施忽视了从供给侧实际需求,从而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如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更多地引向高度依赖投资的粗放型行业,以满足地方政府和官员追求政绩的需求。另外,商业银行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需求,希望从政府获得“垄断特权”,通常积极、主动迎合政府,以满足政府的资金需求,以期从地方政府获取大额或来源稳定的存款、优质的贷款项目、表外业务等,以获取超额利润,其信贷资金的发放带有一定程度的行政化干预的色彩。

2. 金融机构放款偏好过度,双重信贷配给明显

金融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不合理配置,导致金融资源效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造成经济的结构失衡。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商业银行偏好于向国有企业、房地产行业和政府投资项目投放贷款,而代表着未来经济转型希望的、更具活力的大量中小企业、高科技行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未能缓解。由于我国信贷传导机制的特殊性,使得各商业银行在对企业进行资金配置过程中双重信贷配给行为较为明显。一方面,各金融机构为了争夺有限的黄金

客户,必然要选择国家支持的产业和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信贷扶持,不断向大型企业、热门企业和重点企业投放资金,而对那些规模小、回收周期长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实行歧视性信贷。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以及风险防范的本能使得其在进行金融资源配置时,尽可能地根据市场机制对信贷对象进行甄别,由此形成了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信贷配给。即通过信贷歧视政策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贷款数量、期限和利率、担保方面实施严格的信贷限制,出现了中小企业信贷上的增量位移。这种双重的信贷配给特征,兼容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双重作用,最终导致基于双重信贷配给的金融资源大部分供给了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市场化特征明显的非国有企业却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由此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信贷传导机制的低效率。

3.金融的逐利性,造成区域间金融资源配置差距过大

金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金融资源在不同区域内配置总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信贷资金的供给程度,可以直观地表明区域内的资本造血能力。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主体——各层次金融机构,基于安全性、营利性、流动性的要求,对中心城市的偏好,在耗散结构理论中的极化效应作用下,存贷余额、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空间上不断向中心城市靠拢,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由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农业基础底子薄,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并没有彻底改善,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吸纳能力比较弱,耗散结构理论中的涓流效应并没有在农村显现,金融资源交易成本并没有达到拐点,中心大城市累积的丰富的金融资源没有带动周边农村金融发展,农村大量金融资源仍然流向城市,呈现出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造成边远地区和偏僻的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金融资源供给总量明显不足,金融资源在空间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城乡不同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有明显差距,资金的供求结构不均衡,远远不能满足区域内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致使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城镇相比比较缓慢,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甚至在某

种程度上还制约了“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4.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后劲不足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对资金有迫切需求,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自身的限制,企业内源性融资已经很难满足转型需求,能够获取大量外源融资的渠道、特别是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依据前述中部六省金融资源配置情况调查,尽管股票市场规模增长迅速,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但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比例仍旧偏低,以直接融资为特征的资本市场规模仍然偏小,无法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直接融资渠道仍然狭窄,流动性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尚不成熟,导致供给不畅。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结构单一,主板市场准入条件高,能满足这些条件的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基本上被排斥在这道“门槛”之外。另一方面,在资本市场方面,参与股权交易市场时需要付出的资产评估和信息披露费用、审核批准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复杂的融资手续所耗费的成本等远高于信贷渠道和内源融资所付出的融资成本,融资成本高成为制约企业采用直接融资的因素之一。融资的主要渠道过于单一,特别是直接融资渠道发展较为缓慢,融资效能低下,资本市场后劲不足,企业所需的长期、大规模、运用灵活的资金较难通过股票市场筹集。

5.地方政府服务理念不到位,影响资本市场相应配套机制对接

融资的需求与供给,不仅体现在资金上,还体现在资本市场资金的供给方为需求方提供的整体融资服务上。融资行为有效的关键在于融资的需求和供给实现对接,达到平衡,从而使资金的供给方把资源提供给能够最有效地使用资金的资金需求方。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只关注资本市场交易量,对资本市场配套机制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服务意识差,服务措施不到位,相关的制度、运行机制缺失,资本市场还不能为企业融资提供有效的平台,造成融资流程效率低,金融资源配置不畅。如相应的资本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信用化程度较低,为企业融资服务的各类社会中

介组织发育很不充分,面向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并不完善,致使部分资金需求者在进行贷款时,不知道提供什么样的抵押物,不知道在哪里进行抵押物价值评估,导致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的同时也提高了融资过程中产生的道德风险。另外,地方缺乏推动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制度平台,影响资本市场相应配套机制对接。如资本市场上企业信息披露制度体系不健全,企业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内部化、不透明的,基于风险管控目的,金融机构会提高融资条件,企业为了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不得不在主管部门、金融部门、评估机构、物价部门、审计部门等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无形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影响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深度和广度。

四、中部地区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路径选择

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可以使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使更多的融资机会转向绿色发展,并通过过剩产能的淘汰、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部地区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路径建议如下。

1. 转变政府角色,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环境

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应该坚持以金融市场供求关系为主导、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辅助,确定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一是政府应遵循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合理确定角色。地方政府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合理明确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应遵循市场经济供求状况,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资源配置体系,转变职能。地方政府从直接的行政干预金融资源配置转向构建和维护合理的金融生态环境,借助金融市场上资金的需求来进行针对性的金融资源分配,进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二是政府制定调控政策应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宏观调控政策往往是依据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来制定,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和市场供求关系,实行差异化的金融调控政策,对不同地区,依照资源禀赋特点实行不同的调控策略,如对边远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就应实行不同于中部核心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要注重从

宏观上制定导向性的金融资源配置政策,合理引导金融资源流动,促进区域间产业的合理分工和布局,有效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区域经济的产业协调发展。三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促进金融资源配置高效。构建一个社会信用状况良好、法律政策环境透明、中介服务体系完善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地方政府应合理行使自身监管与调控的职能,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减少过多干预,助推金融机构高效配置金融资源,淘汰或转移落后存量产能,严控新增产能,引导带动性强、高产出、低消耗、发展潜力大产业项目的建设,推动经济高效发展。

2. 加强金融资源供求双方沟通交流,促使金融资源配置更具针对性

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机构应及时与资金需求实体经济单位进行充分沟通交流,了解其对资金的需求类型,进行针对性配置,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一是金融机构要有主动服务意识,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资金供给。针对金融资源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金融机构应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推进中小社区银行、民营银行等新型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大金融资源供应总量,引导金融资源的流动,降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的难度,推动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中的合理流动,避免资金空转问题,为可投资资源生产力的提高和有效利用提供资金支持,进而全面推进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二是及时了解资金需求方的需求信息,提供多样化服务,满足资金需求。金融机构应及时与实体经济单位沟通交流,认真研究不同产业、不同领域和不同企业的资金需求的结构和用途,在保证资金安全回笼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公开市场、再贴现、再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尽量满足实体经济单位不同层次、不同期限的资金需求,完善信贷体系,扩大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融资来源,引导各方面资金流向绿色产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三是要自我完善金融机构业务运转体系,改变金融资源配置偏好。金融机构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势,改变长期以来对落后区域、民营经济实体、小微企业的“失信推定”,消除对待不同区域、不同企业背景薄此厚彼的倾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建立信贷资源配置的科学、全面、合理的运作机制,消除在信贷政策、信贷

业务和内部考核等方面的所有制歧视,真正做到在思想观念和实际行动中“知行合一”,有效发挥金融资源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功能的提升。

3.均衡配置金融资源,加大对经济发展薄弱区域的信贷投放

加强金融资源区域均衡配置,利用耗散结构理论的涓流效应,促使金融资源由核心区域向周边区域扩散,形成金融带动效应,实现产业在地区间合理布局,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是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合理引导资金向周边区域渗透。制定优惠的政策,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在保证金融机构经济效益和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金融机构区域布局,沿着产业规划路径,在需求层面合理引导资金流向,鼓励金融机构主动向边远地区渗透,向高新技术领域、绿色生态经济领域倾斜,加大向经济薄弱地区投放金融资源,缩小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促进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二是理顺金融资源配置渠道,缩小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差异。为吸引金融资源向欠发达地市流动,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地方政府应通过对资本市场微观调整,完善金融机构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配置环境,分散和降低金融资源的配置风险。另外,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实体经济单位经济行为可行性把关,从政策、产业规划和经济效应角度进行审核,为金融资源流入经济欠发达地区保驾护航。三是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能力。为缩小金融资源区域差异,发挥金融资源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地方政府应加强国有金融机构与地方金融机构的全方位合作,扩大地方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来源,促进地方经济高效发展,同时,提高国有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另外,积极引进实力雄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经济欠发达地区,或与当地金融机构合资,一方面,为当地带来新的金融资源和先进经营理念;另一方面,加大地区间业务的竞争,从而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的自我完善,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4.拓宽金融资源配置途径,增加金融资源配置来源

应拓宽金融资源配置途径,增加金融资源配置来源。一是增强经济实体实力,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灵活转化。通过制度设计、政策保障等方

式给予经济实体全方位足够的支持,增强其实力,使其能够达到上市的基本要求,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积极发展公开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天使投资等,实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灵活转化,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各类投资机构参与对实体经济单位投资,增加可用资金规模,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增加金融资源总量,提高金融服务的能力。二是加大债券融资力度,拓宽金融资源配置路径。疏通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连接,加大债券融资力度,依托多层次金融市场,综合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利用债券融资成本低、灵活性强的特点,设立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加强公司债券、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私募债以及资产支持证券(ABS)等方式应用,拓宽金融资源配置路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扶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三是发挥保险增信功能,提升多元化金融服务能力。充分挖掘银行和保险内在联系的紧密性和业务逻辑的衔接性,发展产业化服务型保险类别,构建“保价值”式的保险体系,利用保险对企业的增信作用,帮助银行业金融机构识别风险意识强、财务稳定性高、风险水平低的经济实体单位,为其获得银行信贷资金提供信息支持,促进资金需求实体单位的“保险+信贷”组合金融服务,降低风险、扩充金融资源配置数量。

5.完善配套保障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应完善与金融机构相配套的资源配置保障机制,发挥金融机构信贷主渠道功能,保证金融资源科学、合理、有序流动,促进经济高效发展。一是构建和完善考核机制,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指标,在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把国家的产业规划、产业布局纳入到考核内容之中,把金融机构的业绩考核同支持经济落后地区、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经济发展挂钩,并进行动态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遏制信贷投放过度集中现象,调整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扎扎实实地在金融服务理念、机制、产品等方面进行创新,为金融资源高质量配置提供有效支持。二是加强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成本。构建种类齐全的信息数据库,利用远程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实现全社会信用信息的共享,降低服务门槛,以更便捷的智能信贷,持续扩大数据来源和使用维度,深度发现客户需求规律,努力实现精准营销、精准服

务、精准管理,坚持市场化定价原则,完善尽职免责机制,充分利用流动性管理、信用支持担保工具和差异化监管等手段,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是建立信用评价制度,营造良好信用环境。加强信贷运行监测和综合分析,采取定性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宏观把控和微观调整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建立重要行业与基础产业的信贷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加强对征信机构的日常监管,构建全社会联动机制,对恶意逃避金融机构债务的经济实体和个人给予一定程度的约束和相应处罚,对信用记录良好的企业和个人应予以保护和激励,从而为金融资源科学、合理、高效配置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信用环境。

参考文献

-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2]Goldsmith R W.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69, 70(4).
- [3]Hirsch A M, Bauer W D, Bird D M, et al. Molecular Signals and Receptors: Controlling Rhizosphere Interactions between Plants and Other Organisms [J]. Ecology, 2003, 84(4).
- [4]高国力.推动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区域经济布局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 2020(4).
- [5]宋保胜,宋嘉宁,宋曼,等.科技城镇化资金需求及金融资源有效供给的对接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18(5).
- [6]白钦先.经济金融文集(第二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9.
- [7]Stiglitz J,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17).
- [8]郭婷婷. 厦漳泉经济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研究[D]. 中国厦门:集美大学, 2015.
- [9]马娟. 利率市场化、地方政府干预与信贷配置效率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 2017.
- [10]王擎,潘李剑. 转轨时期的政府干预、银行行为及其经营绩效[J]. 金融监管研究, 2014(6).

Study on the Path Optimization of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n Middle China

Song Baosheng Wu Qilong Zhao Mingzheng

Abstract: The effective allo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use, promote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n increase soci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policy system, initi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benefit indicator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in middle China present the phenomenon of mismatch and mispairing in the process of allocation.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an not release its full potential, which leads to the imbalance of capital supply and demand, the serious shortage of effective supply and other problems, and the financial energy is inhibited to a great ext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middle China, it is necessary to adjust stocks, optimize increments, resolve unilateral constraints such as policies, markets, and interests, and set up different levels of allocation paths such as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ty,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resources, so a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stabl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Key Words: Central Region; Financial Resources; Spatial Heterogeneity; Pareto Optimization

(责任编辑:晓 力)